

第一章 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1976年—1982年)

从 1976 年到 1982 年，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又以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而分为前后不同的两个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拨乱反正初步展开，但从整体上看，党的工作处于徘徊前进的状态。经过邓小平、胡耀邦的思想发动和 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造成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党的正确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党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 1981 年 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为标志，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在此基础上，1982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宣告历史性伟大转折已经实现，并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第一节 “文革”的结束

1966 年至 1976 年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人民造成了空前的灾难。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 1971 年曾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折戟沉沙 机毁人亡”后，许多人由原来的疯狂、盲从中醒悟过来，逐渐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怀疑、不满以至抗议，并在 1976 年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主席逝世。10 月 6 日“四人帮”被粉碎。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终止。1977 年 8 月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人民的觉醒

1976 年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十个年头，也已接近尾声。政局的发展让人捉摸不定。

1976 年 1 月 8 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当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十里长安街两旁，为周总理默哀送灵。这种万人同哭的悲壮场面，反映了人民为失去周总理而难过的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人们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周恩来逝世后，经毛泽东提议和中央政治局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个决定。这是对“四人帮”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有力的打击。就在公布这个决定的同一天，没有实现

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二月三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逞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群众性的悼念活动，并开动他们所控制的宣传舆论工具，恶毒诬蔑攻击周恩来以及悼念周恩来的广大群众。从 1 月 9 日到 15 日追悼大会以前的 6 天当中，新华社总共只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而在报道人民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消息时，姚文元把原报道中有关首都百万人民泪洒长安街为周恩来灵车送行的情景描写砍得干干净净。2 月 13 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孔丘之忧》一文，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大批“忧”字，把悼念周恩来的人民污蔑为“哭丧妇”。3 月 25 日，《文汇报》在第一版的新闻报道中说什么“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恩来、邓小平。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无比愤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在酝酿之中。

最先站出来的是南京市的学生和工人。他们贴出“打倒张春桥”、“追查《文汇报》攻击周恩来的黑后台”等大字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进行悼念活动。接着，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人民群众也都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

首都的人民群众从3月底开始，冲破禁令，连续几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4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贴出了一首后来被“四人帮”引为“○○一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的诗：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4月1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当前事态，认为全国各地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提出要追查。4月2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不准人民群众去天安门悼念周总理。但人民群众没有听从这一规定。4月3日，首都几十万人民冒雨从四面八方汇集在天安门广场，把精心制作的花圈、花篮、挽联、诗词以及其他悼念物品，敬献在纪念碑周围。这一天，在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

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

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

4月4日是清明节，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抗议“四人帮”的活动达到最高潮，来到广场的人数达到200万人次。天安门前，纪念碑下，人潮似海，花圈如山。人们对敬爱的周总理怀念的激情象波涛澎湃，对万恶的“四人帮”的愤怒似火山爆发。读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泣不成声，看声讨“四人帮”的檄文义愤填膺。人民抗争的怒潮激动人心。

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

北京市负责人吴德在会上作主要发言，他在介绍了天安门广场上送花圈和诗词的情况后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活动。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明显地是拿死人压活人，是党内走资派把矛头直接指向主席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这次这样的逆流。过去都是说相信毛主席，这次根本不提主席，敌人比过去更猖狂。华国锋在会上说：“一批坏人跳出来了，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是很恶毒的。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转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首都工人民兵组织好；卫戍区部队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北京军区要稳定，指定一定的机动部队，以防万一，从今晚（4号）开始，清理花圈和标语，明天开始，布置民兵围绕纪念碑，劝说阻止群众去送花圈和集会，不再允许进入这个范围。

联络员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获得毛泽东阅阅同意。

4月5日凌晨1时，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下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当作“罪证”。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7人因抄诗或“可疑”被捕。

4月5日清晨，当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到花圈、花篮被收走了，诗词被撕毁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看守花圈的战友被抓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恐怖气氛笼罩着天安门广场时，人民群众被激怒了。几十万名群众聚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并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但没有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轿车一辆。下午3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5点零4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

4月5日下午6点25分，天安门广场所有的高音喇叭同时开放，反复广播北京市负责人吴德的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

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广播吴德的讲话后，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逐渐减少。晚上 9 时 35 分 广场的照明灯全部打开 整个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的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 隐蔽待命的 1 万名民兵、3000 名警察和 5 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一齐出动，迅速封锁天安门广场，对赤手空拳的群众进行殴打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

对于 4 月 5 日的天安门事件“四人帮”成员之一的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

下午二时 政治局紧急开会 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 打了民警 打了革命群众 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一批人在记（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 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指向中央 提出要邓小平上台 喊“总理万岁！”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今晨，我已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上报告并请远新同志报主席。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

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均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响了,吴德同志录音讲话反复讲反复播放。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

带着棍子的民兵雄纠纠、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①

4月6日凌晨 部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开会 集中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事件是“反革命暴乱性质。”毛远新于4月6日3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政治局会议情况 毛泽东于4月6日11时批示：“士气大振 好好好。”

4月7日上午 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时 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 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又说 中央政治局作决议 登报。这次，一、首都 二、天安门 三、烧、打 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议华国锋任总理，一起登报。7日下午，毛泽东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

第一个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 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保留党籍 以观后效。

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后一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

治事件》的报道。之后 全国各地进行政治表态 组织拥护中央两个决议和声讨邓小平的集会游行 并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一次以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为内容，实际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正确领导 反对“左”倾错误的人民革命运动 鲜明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这场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也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了历史的前提。

毛泽东悲观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正因为如此 坚持和维护“文化大革命”就成为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

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以后 随着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态度甚至抵制、反对的人越来越多 毛泽东也越来越深重地忧虑“文化大革命”被否定 并采取了种种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措施。

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针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并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泽东明白，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想将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为了维护“文化大革命”就必定要否决批判极“左”思潮的正确意

见。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根本上也是要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批林批孔’不过是借题发挥，实质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感到，“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受到抵制，这与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有相似之处；而批孔和肯定法家的进步作用，可以使人们理解和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不过，毛泽东虽然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也承认“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在1975年1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毛泽东对邓小平重新表示信任，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自相矛盾的。本来，邓小平的整顿是根据毛泽东说过的一些原则办的，如“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文艺要调整”等。但在如何整顿的问题上，本质上是不同的。事实上，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是在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而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1975年9月底至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毛远新说：“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的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认为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 二是要算帐 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 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仍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 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拒绝。他说，由我主持定这个决议不适宜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1976年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 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是纲 其余都是目。”“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他 邓小平 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 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 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认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 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 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 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和批评，说明他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因而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毛泽东这些谈话中有关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当时对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在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的这次会上，即要求揭发、批判邓小平，解决“转弯子”的问题，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但事与愿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违背了人民的意愿，是很不得人心的。

毛泽东虽然极力维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心里明白，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本来，毛泽东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做任何事情都有着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但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对自己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不再绝对自信了。

在1976年他逝世前的几个月，社会上传出一段他说自己一生和后事的话。据说是6月13日，毛泽东在病榻上跟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谈话，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金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

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以上这段话 很能反映毛泽东去逝前的悲凉心境。他向华国锋等人苦心交待 是希望他们维护“文化大革命”但他本人对此已没有多大的信心。毛泽东悲观了。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为失去这位伟人而极度悲痛，同时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深感忧虑。“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天下大治”的理想却未能如愿实现。毛泽东先前没有从制度上真正的解决好领导集体交接班的问题，因而他刚一去世，党内高层的政治较量就不可避免。而他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是错误的，因而终究要结束以至被彻底否定。

逮捕“四人帮”的行动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9 月 11 日，王洪文搬开中共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在吊唁期间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王洪文报告。此举意在切断中央政治局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取代党中央的领导。江青想方设法盗窃毛泽东存的文件、材料和手稿 企图加以篡改 作为篡党夺权的依据。“四人帮”及其爪牙指使一些人写“效忠信”、“劝进信”为江青的上台制造舆论 同时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在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白卷英雄”张铁生就露骨地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

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迥然不同，但起码有差距。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

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 而不是内部传达 反响很大 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②

10月1日 江青在清华大学讲话 诬蔑邓小平“迫害毛主席”，说“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 要开除他的党籍。”还说：“我也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10月3日 王洪文跑到平谷县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 你们怎么办 打倒！”“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 但这只是个人愿望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 出是可能的 不出是奇怪的。”

为了以党的“正统”自居，“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9月16日 两报一刊社论中首先抛出这一所谓临终嘱咐，随后全国报刊舆论连篇累牍地加以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 把原稿中“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删掉。华国锋批示 发言

稿“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但“四人帮”仍坚持其伪造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说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显然，“四人帮”是要标榜只有他们才是毛泽东临终嘱咐的特定接受者，而华国锋等人是所谓篡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修正主义头子。

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就要发难，一场反革命政变迫在眉睫。

面对严峻局势，以叶剑英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都心急如焚，逐渐想到了一块。叶剑英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作了酝酿和认真考虑，并得到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

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让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命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③

9月21日，聂荣臻通过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

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④

叶剑英完全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并嘱咐杨成武要做到胸有成竹。叶剑英还接见粟裕、宋时轮等人，让他们加强戒备。

华国锋因同“四人帮”的矛盾逐渐激化，也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对“四人帮”“伪造和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华国锋开始时未予特别介意，而在了解了“四人帮”的真实意图后才引起了高度警觉。特别是华国锋 9 月 21 日听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汇报“四人帮”要动武的情形，更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他就同汪东兴商量。华国锋说：“他们这是搞阴谋诡计，搞分裂，搞篡党夺权，怎么办？”汪东兴说：“他们很可能要搞武装政变，事不宜迟，赶快下决心吧。不然等他们动了手，一切全完了。”华国锋翻开他的笔记本念道：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汪东兴说：“有主席这个讲话我们还怕什么！”汪东兴建议华国锋尽快同叶剑英商定。^⑤当天，华国锋即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9 月 24 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⑥

经过李先念的沟通，华国锋与叶剑英来往频繁，共商对策。经过商议，他们制定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和周密部署。他们一致认为，“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集团，同他们的斗争不宜采用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法来解决，决定以召开会